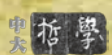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
哲學系
哲學文學碩士
MA IN PHILOSOPHY, CUHK



MA in Philosophy, CUHK
Since 2004



食素是否比食肉更有道德？

很多人認為動物有生命，我們不應該殺生，所以不吃肉。有人不吃豬牛羊雞等生物，但會吃魚蝦蟹等海產，因牠們沒有神經線，不會感到痛楚。茹素者，會吃蔬果鮮果，都是植物，植物都有生命，在此基礎上，食肉跟食素好像沒有分別，都是食有生命的東西。食素是否比食肉更有道德？

這個問題要看你抱持哪個規範倫理學立場。一般素食者之所以不吃肉，是肉大多來自能感受痛苦的動物身上，偏偏在現代的飼養業裏，為求最快把動物飼養得可供食用，飼養者以針藥催谷有之，以狹小空間飼養最多動物有之，以殘忍屠宰減低成本有之。簡單來說，動物從出生到屠宰，每一刻的生活都是痛苦的。如果你持守效益主義，道德上對的事情是增加福祉，減少痛苦，那麼我們應該不吃肉，畢竟不吃肉不過是人類失去口舌之樂，相比動物一生的痛苦實在微不足道。

當然，假如你持守 Tom Regan 的立場，認為不該吃動物的理由是牠們的生命本身就有價值，就像人一樣，不是可給其他人的快樂凌駕，那麼，我不否定，把這個理論伸展下去，有生命的魚、植物也不該吃。這理論可以解釋為何有人認為應該只吃樹上跌下來的水果。

哲學家培根曾說「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但文學家蘇東坡說「人生憂患識字始」，似乎知道得愈多，人生就會愈失落，知識真的重要嗎？

首先要解釋「知識就是力量」是甚麼意思。「知識」比較易明白，就是有證據支撐的信念，但是「力量」容易引起誤會。Power 令人想到權力和控制，而權力和控制本身就令人反感，這令人很自然贊同蘇東坡那句話：權力和控制令人困擾，應該除去。但「力量」不必這樣解，它可以指人類創造福祉、趨吉避凶的能力。舉個顯淺例子，天文知識可以令人類較準確預測颱風路向及威力，及早預防。其他知識也可以如此。知識令我們懂得預計，而得益（無論你說哪一種）往往建基於預計。其實蘇東坡那句話我不肯定他是失落時這樣說還是認真時這樣說。失落這樣說不必計較，認真時這樣說卻有點矛盾：他正正是靠知識才知道憂患，才知道哪些人要親近哪些要疏遠，知識其實幫了他看懂人心、趨吉避凶。沒有知識的話他才更危險。

災難是無可避免的嗎？

越是危害生命安全的災難，越受到人們關注，這已經成了現代資訊社會的慣例。幾年前的汶川地震、日本 311 海嘯和其引起的核災難，最近的馬航空難和台灣氣爆事件等。災難毫不留情地奪走人命，我們應否期望科學可以幫我們消災解難？

我們之所以信賴科學，因為科學確實有助延長人類的平均壽命，例如發明新的藥物和治療方法，令一些疾病不再是絕症。然而，有一些災難卻是隨科學或科技進步而發生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新科技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戰爭急速地摧毀了自然環境和城市建設，死亡和傷殘者不計其數。1945 年美國向日本投下兩枚原子彈後，人們深深地驚訝科技把文明於一旦。確切地說，原爆不僅奪去人命，更褫奪了人類的反抗能力。奧地利哲學家 and 作家安德斯 (Günther Anders) 在 1956 年出版的《過時的人》說過：「自由的主體和屈從的主體顛倒了，事物是自由的，人卻不再自由。」毫無節制地應用科技，造成不可逆轉的災難，人類無處可逃。當科技可以把整個地球毀滅時，安德斯認為，今後人類不再是面對「如何」在災難後生存下去，原子彈本身就是要質問人類「能否」繼續生存下去。換言之，災難和滅亡的陰影將永遠籠罩人類。

人類有限的自由如何約束科技的應用，避免人為的災難？德國哲學家約納斯 (Hans Jonas) 在 1979 年出版的《責任的原則》嘗試給予答案。他寫道：「基於一定的情況和約定，他人的福祉、利益和命運操於我手，也就是說，我掌控了它們，同時包含我對它們的責任。」當美國投下原子彈時，他們可能想到日後被表揚終結戰爭的功績，但這同時妄顧了人類、下一代和整個環境的生物繼續生存的權利。我們當中有誰人可以宣稱自己有權剝奪後代人和生物在地球上生存的機會？換言之，道德不是出於自己的良好意願，也不是跟他人的契約關係，而是要求我們對後代、人類整個物種和所有生物負責。約納斯寫道：「我們只能對變化的事物負責，對受到消亡和衰落所威脅的事物負責，簡言之，對會消失的事物負責。」

如果我們不能純粹靠科學免除災難，那麼就應該認真看待道德的份量，重新考慮經濟和政治的安排。約納斯以近乎康德的口吻要求我們：「將人類未來的整體放入你當下的選擇之中，作為你意欲的對象。」天災難料，誰知道地震海嘯何時會重來？過去的災難記憶提醒我們道德的重要，在他人的死亡和自己的死亡之間，我們必須負起對人類和環境的責任，進而期望不太災難性的命運。

信仰是不是一種「巴斯卡的賭博」？

巴斯卡 (Blaise Pascal) 曾提出「賭博論證」，意指把信仰當為賭博，你信上帝，就可得永生，上天堂。如果死後真的有天堂和永生，你便贏了，但如果沒有，也毫無損失。由是，信仰可能是一種可能贏而不會輸的賭博，你認為信仰是這樣的一回事嗎？這種信仰態度，是不是一種功利主義的態度？

巴斯卡「賭博論證」的基本推論：「因為信上帝的好處多於壞處，所以應該信上帝」，而功利主義基本想法：「正確選擇 = 快樂 > 痛苦」。因為信上帝好處多，而且越多好處，越快樂，所以信上帝是正確選擇。雖然它沒有明確說明，卻預設功利主義為應該信上帝的理由 (前提)。

有人認為「賭博論證」未說明功利主義這「當然」的假設，犯下「不當預設」的謬誤。但論者仍然可以反駁，功利主義的好壞標準是一種普遍的日常標準。正如，普遍人不會認為，正確選擇 = 痛苦 > 快樂。假如我們勉強接受這解釋，「賭博論證」仍然有另一個困難。

設想，你想知道怎樣才是好人。我回答你應該 A+B，因為 A+B 是好的標準。你聽畢，應該會有一個問題：A+B 是甚麼？同樣，巴斯卡的「賭博論證」回答「你應該選擇天堂」，因為天堂最好。但忽略了更根本的問題如「天堂是甚麼」、「地獄是甚麼」、「神是甚麼」。這些問題更根本，因為非教徒只有「上天堂等於好處」的想法，不明白「上天堂」的真正意義：內容空洞的「上天堂」不過是好處的同義詞，宛如上述的「A+B 是好的標準」一樣空洞。

筆者認為，利用巴斯卡論證的教友通常心存：先說服他們信教，再循循善誘教導他們「上天堂是甚麼？上帝是甚麼？」但這做法有本末倒置之嫌。正如近日有論「袋住先則有普選；唔袋則冇普選」；先說服他們「袋住」，再慢慢改革和說明。豈非異曲同工？

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曾言「認識你自己」(Know Thyself)，為甚麼一定要認識自己？甚麼是「認識」？為何指向的對象是自己？鄭板橋曾經在橫匾寫下「難得糊塗」，李白又說「人生得意須盡歡」，人生彷彿只是一場夢，消費玩樂，不是更好嗎？何需認識自己？

柏拉圖認為「認識你自己」與「節制處事」(Be temperate) 同義，是神祇對入廟朝拜人的告誡，提醒他們身為有限凡人應心懷謙卑與自知之明。從性質上看，「認識你自己」不僅止於智性要求，更是一種道德要求；從對象上看，它不僅要求自知，也要求恰當把握一己與無限者的關係。因此，在柏拉圖筆下，「認識你自己」與蘇格拉底「無知之知」的哲學態度相互呼應，勸導追求智慧之人應首先承認自己無知、了解自身界限。

表面上看，消極的「難得糊塗」與重視自省的古希臘哲學精神南轅北轍，但仔細琢磨，兩者其實都由「自知之明」開出。

鄭板橋一次獨入深山探尋春秋古跡，偶遇自稱「糊塗老人」的隱士，其居所佈置雅緻，料其必然大有來歷，於是提筆寫下「難得糊塗」四字。後又得知隱士是退隱官員，曾金榜題名，於是補寫道：「聰明難，糊塗尤難，由聰明轉入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

可見鄭板橋的「難得糊塗」不是未經反省的混沌度日，而是在歷經百味後的人生選擇，追求內心逍遙寧靜。選擇「糊塗」前，需對人之有限性作「清醒」的自省。因此「認識你自己」所強調的自知之明與鄭板橋式的「難得糊塗」並不矛盾。李白的「人生得意須盡歡」也作於仕途失意時，見到人生起伏得失難以掌控，他慨歎與其執迷，不如追求當下快樂更為現實。古希臘傳統雖也強調人之有限，但這只是智性追求的起點，應不斷超越限制。譬如柏拉圖認為愛智者應在順「愛的階梯」拾級而上，逐漸擺脫物質世界的束縛，探求絕對真理。

人有自由決定一己生活態度。無論「糊塗」或清醒，都必須是經過自省和考量後的選擇，如此才真正展現了人「自由」的一面，而非被動地得過且過。蘇格拉底曾說：「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那麼接受人之有限，選擇「糊塗」或「盡歡」，也未必是全無價值的人生。

世
界
無
窮
願
無

盡
海
天
寥
潤
之

多
時

庚
君
毅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哲學文學碩士（兼讀）課程

課程介紹

使命

由 2004 年課程開辦至今，本系堅持：

- 提供正規的哲學訓練
- 培養和提高學員之分析及批判思考能力
- 激勵學員反思當代社會文化問題
- 提升學員對哲學及人文學科的理解及關懷

課程特色

- 全港首個授課式哲學文學碩士（兼讀）課程
- 設有學術獎
(每年選出成績優秀的畢業生，成為學術獎得主。
得獎人可獲得獎學金港幣一萬元，以鼓勵繼續研習哲學。)
- 學風自由，以多元、自由為教育及研究理念
- 由中大哲學系教授或資深教授任教，確保教學質素
- 學習氣氛熾熱，師生關係融洽，同學自組讀書會或討論會
- 開課範圍廣泛，主要探討當代英美及歐陸哲學，儒學、佛學及道家思想與現代人生、生死愛欲、痛苦與快樂、文化批判、應用倫理與道德困境等問題

課程結構

- 本課程為授課式兼讀碩士課程
- 一般修讀為兩年，最長為四年
- 上課時間：星期一至五（下午 6:30 - 9:30）或
星期六（下午 2:30 - 5:30）
- 畢業要求：
(1) 修畢 24 學分（8 個科目）
(2) 於每個研讀範圍內，至少修畢 3 個學分（1 個科目）

有關詳情，歡迎瀏覽本系網頁：

<http://phil.arts.cuhk.edu.hk/index.php>

科目簡介

本課程共有 3 個研讀範圍，分為：

中國 / 東方哲學
西方哲學
應用哲學 (3 個研讀範圍)

為提升學員研究某一特定哲學課題之能力，課程設有「論文：研讀指導」(3 學分)，以供同學自由選修。

科目表 (自由選修，每科 3 學分)

自選科目 (每科 3 學分)：

論文：研讀指導

範圍一：中國 / 東方哲學
中國古代哲學專題研討
近現代中國哲學專題研討
中國哲學史專題研討
儒學專題
道家哲學專題
佛教哲學專題
東方哲學專題
比較哲學專題

範圍二：西方哲學
現代西方哲學專題研討
當代英美哲學專題研討
歐陸哲學專題研討
西方哲學史專題研討
道德與政治哲學：善與義
語言、意義與溝通
形上學與實在性之探究
哲學與概念分析
心靈與認知
解釋、理解與對話：理論與實踐

範圍三：應用哲學
應用倫理與道德困境
哲學與文化批判
文學與藝術的哲學分析
哲學與人之處境：生死愛欲
中國哲學與現代人生問題
思考方法學與辯論
應用哲學專題

(每學年各個研讀範圍內將會開設一定數量之科目，如欲了解每科之內容及詳情，歡迎瀏覽本系網頁：<http://phil.arts.cuhk.edu.hk/index.php>)



La Peste

卡繆的《瘟疫》： 對一部存在主義小說的後現代解讀

劉國英

「在我們這小城裏，可能是天氣的關係，一切總是來得熱哄哄的，同時也是沒頭沒腦的。……我們的同胞們勤奮工作，但總是為了賺更多錢。他們特別喜歡買賣，他們首先關心的，就是做生意。自然，他們也喜愛一些簡單的玩意，他們喜歡女人、電影和海浴。……年青人的慾望熾熱和短暫，至於較為年長者，他們的毛病不外乎參加滾球俱樂部、親友間的飲宴和豪賭的牌局。……」

人道行動理性 vs 科學與行政理性

在《瘟疫》第一章，出現這樣的一段對話：

「我們的同胞從沒有想過，我們的小城竟會成為一個萬眾矚目的地方，……為的是陸續有人因為染上離奇的病而死去。……從這時開始，恐懼、以及與恐懼一起到來的反省開始了。……從此再沒有個人的命運，只有一段集體的歷史——瘟疫——以及所有人的共同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分隔和放逐，以及它們帶來的恐懼與憤慨。」

這場對話是李艾醫生 (Docteur Rieux)、省政府首長及市政府衛生局的醫學專家三方討論應否宣佈城中已爆發鼠疫，應否宣佈「瘟疫」(la peste) 這個字。當李艾醫生說出「鼠疫」時，省政府首長即時關門，恐怕那個字會從走廊傳開去。衛生局的醫學專家堅持，到當時為止，並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顯示鼠疫已在城中爆發。省政府首長則反覆表示，一旦說出「鼠疫」一詞，將產生極嚴重的社會政治後果，因此必須請示上層，等待上級頒佈命令。直接照顧病人及親眼看見病人死亡的李艾醫生，面對前二者推卸責任的態度，顯得義憤填膺：「以這疾病傳播的勢頭來看，若果不能遏止它，就會導致在兩個月內全城一半人遇害的危險。因此，不管你們是叫它做『鼠疫』抑或發高燒，總之，最重要的是阻止它殺害全城一半人口。……我們必須採取防禦措施。」

上述三種態度中，第一種是科學家的客觀態度：衛生局的醫學專家嚴守科學研究的學術嚴格和懷疑精神，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不肯確認已經蔓延的傳染病。這是嚴守科學理性 (scientific rationality) 的態度。

第二種態度，即省政府首長的態度，是謹小慎微的行政決策者態度：沒有詳細估量決策的社會政治後果，以及沒有按部就班依從既定決策程序之前，那怕事情如何緊急，怎樣嚴重，還是按兵不動，直至上級有絕對清楚的指令，才會有所行動。這是行政理性 (administrative rationality) 的態度，這亦是德國社會學家韋伯 (Weber) 所說的科層制中遵守程序的理性，我們的司法制度也依從這種理性操作。

第三種就是李艾醫生的態度，是投身 (engage) 的態度，尤其在建制中束手無策或不作行動之時介入。我們很容易從無疆界醫生及無疆界記者身上發現這種態度，這就是人道行動的理性 (humanitarian rationality)。這態度視人命為至關緊要，一切其他考慮為次要。不論何等高超的技術和客觀知識，若不以人作為目的，其實這已脫離發展一切科學技術與行政體系的目的。

根據此書的描述，我們可以把上述三種態度跟 2003 年香港沙士時

期作對照。由此可見，這部五、六十年前的小說不但沒有過時，而且還能反映當下的具體情況。它具有前瞻性，甚至具有先知性 (prophetic)。

甚麼是先知性呢？如果我們從文藝思潮或西方思想發展來看，二次大戰後，1940、50 年代是現代主義的頂峰。若以今日流行的語言來說，卡繆對上述三種態度的批評，就是後現代理論式的分析。在此我不會對後現代理論作詳盡解釋，但我將順帶提出究竟在甚麼意義下是後現代理論式的分析。從上述三種態度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幾點：

第一，此三種理性態度中，以後現代論說的語言而言，科學理性和行政理性屬於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科學知識和行政體系本是手段，改善生活。但是，這兩種理性在現代世界的發展愈來愈精密，有凌駕一切之勢，忘記了它們本來只是服務人的手段，它們忘記了自身本來目的。所以在疫症開始蔓延時，有些醫生說病人已不可救治了，只好等待全城八成以上的人染上疫症，得到抗體才有救；有些想比競爭對手快一步得到研究成果，考慮著職級躍升的問題；有些則認為救人要緊。究竟研究的目的甚麼呢？是為了登上學術界的殿堂地位，抑或是希望學術成果可以幫助別人呢？我們往往忘記。同樣，行政體系亦是如此，所以我們覺得行政的關卡不合理。因此持這兩種態度者可以嚴守科學的客觀性和行政程序的合理性，卻把救人的任務放在次要位置——不顧「以人為本」之基本目的。對工具理性的批評，指在科學知識及行政體系上追求精進到一個地步，我們忘記了它們本來只是用來服務我們，提升我們的生活，幫助人類發展。卡繆對此作出反思，猶如西方學術界對「工具理性之批判」(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其實同一時期德國法蘭克福學派便以理論方式表達這種論說。時至今日，大部份後現代論者都同意，對工具理性之批判是後現代理論論說的先驅。

第二，把以上三種態度並置，最後高舉「以人為目的」之態度，其實是一種隱含的批評，這意味著前二者並無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此並列之下，科學理性態度不但不是對事物的唯一態度，更甚者，如果科學理性態度脫離社會脈絡、遠離人道關懷，並不足以面對人類社會陷入種種的集體危機。明顯地，這亦是一種後現代式的分析。李歐塔 (Lyotard) 在其大作中《後現代處境》，指出科學理論只是眾多論說的其中一種，而且科學並不是站在殿堂之上，對我們發號施令。後現代一個重要的反思是：神話不只是來自神話自身，科學本身亦可以是神話——在現代世界中科學的至高無上、全能的地位便是神話。後現代論著的工作之一，便是對科學知識作出去神話化或解除迷思 (demystification)。

(如欲閱讀全文，請參看





入學資料

入學資格

- 獲得認可高等學府之學士學位，學科不限
(毋須主修或副修哲學)
- 符合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所規定之入學資格，
詳情可瀏覽：<http://www2.cuhk.edu.hk/gss>

報名方法

(一) 申請人提交一篇二千字的自述 (中英均可)，說明申請人對哲學的認識、申請原因、以及感興趣之哲學課題。若申請人曾修讀任何與哲學相關之課程，請提供證明文件。(請把自述及證明文件直接寄抵本系，地址見於「歡迎查詢」一欄。)

(二) 2014 年 11 月開始，研究院將接受網上申請。
詳情可瀏覽：<http://www2.cuhk.edu.hk/gss/apply.php>

入學諮詢講座 (歡迎參加)

第一次

日期：2014 年 12 月 6 日 (星期六)

時間：2:30 - 4:30pm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 YIA LT2

第二次

日期：2015 年 1 月 17 日 (星期六)

時間：2:30 - 4:30pm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 YIA LT2

(屆時任教老師將出席講座，講解課程內容及入學的詳細資料。)

參加講座，請致電 3943 7149 或於本系網頁下載。

歡迎查詢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 4 樓哲學系

電話：3943 7149 (文學碩士課程)

3943 7135 (哲學系辦公室)

電郵：phil_MA@cuhk.edu.hk

傳真：2603 5323

網頁：<http://phil.arts.cuhk.edu.hk/index.php>

香港中文大學
哲學系
哲學文學碩士
MA IN PHILOSOPHY, CUHK

